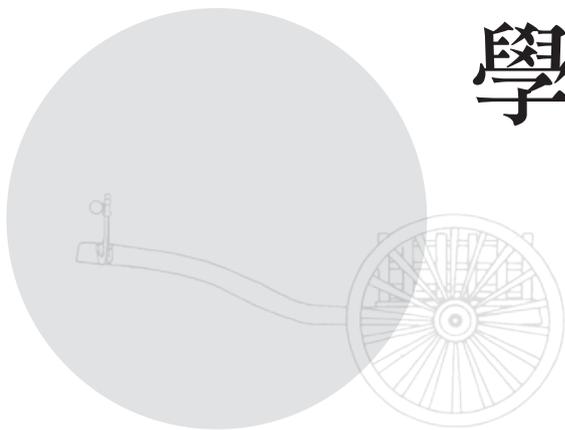


比較考古學 隨筆

李學勤
著



中華書局

序

饒宗頤

李學勤先生集合近年所著論文二十篇，總題曰：《比較考古學隨筆》。他在引言中提出比較研究應該有五個層次，即是：①中土不同時代的比較；②中土與邊緣地區的比較；③中土與鄰邦的比較；④中土與太平洋地區的比較；⑤中土與其他古文明的比較。漸次推進，可說是由近及遠。他不是一位純粹主張傳播論者，而是實事求是，揭發一些在不同地區而有某種相同的文化現象，作出極有啟發性的提示。本書所指出的二十件大事都是富有興趣而能夠引人入勝的古史上的重要「問題點」。李先生與我為多年知好，他認為我在古史的鑽研方面和他有一些相同的傾向，故此引為同調，要我為他的著作寫幾句話，真使我受寵若驚，既有了「共同語言」，我亦不辭「佛頭著糞」之誚，斗膽地答應了。

先民在踏入農業社會以前，有一段漫長的狩獵時代，當時的生活狀況可以說是行國，還不是居國，如果在氣候變化或者大型的軍事行動發生時，人口必有很大流動和轉

徙，雖是天南地北之懸隔，由於傳播的結果亦可出現一些相同的東西。近代的古史學者，很喜歡從東西兩個極端作出比較的論點，從王國維的古籀分東西說，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以至近時的文字上象形指事的東西說，已經成為一套濫調，反之，從南北的角度來看問題卻如鳳毛麟角。李先生書中對江西的吳城新干和百越文化所受到北方的影響，有十分有趣的分析，真是巨眼若燭。最近香港南丫島大灣瀕海地帶竟有帶鋸牙的玉璋出土，和二里頭及陝西神木的牙璋很相像（但與本書所談的三星堆蜀國式的岐尖加飾的牙璋不同），而大灣的彩陶紋樣與湖北大溪遺物有類似之處，亦足證明中原文化之南被。古書所說「五十萬人守五嶺」分明是誇大的話，但先秦禮器的傳播遠及海滋，正可為南北交流提供一物證。

李先生談規矩鏡、日晷、博局都是八極紋三位一體，我嘗推測安徽含山玉龜裏頭所夾的玉片上面的紋樣即指示八方、八極，是空間觀念的表現而不是曆法，玉片鑄刻的小圓點作數字的排列，可與河圖洛書比較，而玉版夾在靈龜中，不啻是「河圖玉版」的寫照。（文見拙作《史溯》）

談及西北絲路，李先生指出虎噬鹿器諸動物紋樣與斯基泰文化的關係。按 Scythian 即是所謂塞族，本稱 Saka，其名見於出土之古波斯文石碑。斯基泰本為波斯

國之一省，Saka 於埃蘭文（Elan）作 sa-ak-ga，阿卡得文（Aecadian）文作 gi-mi (r) -ri，希臘文作 ε(s) kiθης，與西北民族有甚深之血緣關係。周原召陳村出土蚌雕外國人頭像頭頂鑄一卍字，有人說即是塞族。我曾指出在西亞公元前五千五百年前 Halaf 地區的陶器和女神肩膀上亦刻有卍的標識（說見拙作《絲綢之路引起的文字起源問題》）。西亞與中國交往在近年考古學上的物證象瑪瑙珠在滇池區域出土之多，只江川李家山墓地即有八〇七九枚（詳張增祺《戰國至西漢時期滇池區域發現的西亞文物》）。廣東南越文王墓的銀盒，已被證明為波斯 Xerxes 一世（公元前四八五年至公元前四六五年）時期的遺物。中外文物交流的年代已可推前，早期商業貿易的記載包括陸路與海道，如《魏書·西域傳》所說：「大月氏世祖時，其國人商販至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玻璃。」《梁四公記》說：「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璃鏡……」（《太平廣記》卷八一引）。我們看楚滇各地的玻璃器以至廣東肇慶戰國墓和南越王墓出土之琉璃均可證明上面的記載事實上在先秦時代已是如此。吳時薛綜上疏有云：「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奇物充備寶玩。」南越王墓中的各種寶玩正說明海上商販在西漢初期已是相當發達了。

楊希枚兄分析西北岡出土的三百九十八具人頭骨的複雜性，其中有海洋類黑人種，第五組他懷疑與印度人的頭骨很接近，又證明有二三具幾乎無殊於歐洲的類是高加索人種。我在一九七三年考證印度的 Cinapatta 與蜀布的關係，附帶提到崑崙舶和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現在已成為熱烈討論的課題。張秉權著《甲骨上黏附的棉布》一文指出殷代出土龜甲雜有棉布，即土盧布，相當榜葛刺國所謂兜羅棉，此外武夷山船棺葬亦出有棉布，證明身毒貨物在殷代已有交流跡象。在北高加索山區的巴勒卡（峪）海拔一千尺墓葬出土絲織品多件，其中文書殘片有漢文三行（俄文考古報告，見張廣達《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北京大學學報一九八五，第四期），此為唐代遺物，遠古情形，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銅在西亞起源甚早，𠂇即其初文，楔形文稱 urd-du。姜寨第一期遺物出有黃銅片和黃銅管狀物，冶煉方法比較原始。甘肅齊家文化、火燒溝文化發現銅器遺址，時代相當於夏。文獻的記載像《墨子·耕柱篇》說：「昔者夏后開（啟）使蜚廉采金於山川，而陶鑄於崑吾。」鑄銅始於夏，古代已有此說，和出土文物正可印證。

記得若干年前，故友三上次男博士自埃及考察返國，道經香港，贈給我一些在中東遺址拾得的陶片，我說古代

東方陶瓷傳入近東，和阿拉伯人經商的香料之路有同等價值，後來他寫成《陶磁之路》一書，影響至今。李君書中有二章敘述銅鏡在中東一帶的傳播，描寫至為生動。大家習慣「絲綢之路」一名，其實，以某種特產在商業活動上來代表文化之交流，銅鏡之路、香藥之路、陶瓷之路和絲綢之路是同樣重要的！

我近年研究陶器上的符號，相信新石器時代，老早已開拓了「陶（瓷）之路」，形成東西文化上的接觸，三上博士的說法可以推前。從許多相同的陶符分佈情形看來，遠古時代不免互有交往，我的看法有下列幾點：

① 文字未形成以前，有一段漫長時間，流行某一記號，代表某些吉利、富有的意義，可說是「陶符時代」。

② 這些同形陶符的傳播，東南地區亦會出現，諸夏境內，一向華夷戎狄雜處，正可說明這一現象。

③ 中外亦有不少同形記號，我嘗舉出𠂇、卍、⊗……等字為例，說明古代陶器之路早已存在。

我另有專書作詳細研究，李先生比較中埃文字發展的過程，有類似之處，他很關心這一問題，我希望李先生他日亦為我的書寫一序文，斟酌切磋，投桃報李，李先生必定能首肯的。

李先生此書以深入淺出的文字，提出許多嶄新有趣的

問題，論點十分可貴。他的廣博的視野和縝密的分析，加上他有機緣接觸許多實物作仔細的考察，所得的結論，不是一般關在屋子裏作海客「談瀛」的人們所能做到的。

本書的出版，無異古史學與考古學二大流結合誕生的一個新果實，是一項重要成就，我想讀者看過本書之後，必有與我相同的感受。

一九九一年六月

目
錄

序	/ iii
一 引言	/ 001
二 青銅器與商周文化的關係	/ 011
三 曲阜周代墓葬的兩種類型	/ 018
四 規矩鏡、日晷、博局	/ 026
五 三星堆與大洋洲（上）	/ 035
六 三星堆與大洋洲（下）	/ 044
七 百越的尊、卣	/ 052
八 蜀國的璋、壘	/ 060
九 中國銅鏡的起源及傳播	/ 069
十 續論中國銅鏡的傳播	/ 078
十一 中國和中亞的馬車	/ 087
十二 虎噬鹿器座與有翼神獸	/ 099
十三 新西蘭玉器的啟示	/ 107

十四	甲骨占卜的比較研究	/ 118
十五	印第安人的「饕餮紋」	/ 128
十六	土墩墓異同論	/ 139
十七	早期的銅器、鐵器	/ 149
十八	古埃及與中國文字的起源	/ 160
十九	「片雲戚」的故事	/ 169
二十	中、日、英三國出土木簡	/ 180
後記		/ 189



引 言

這本小書在標題上寫出「比較考古學」的字樣，目的並不是要杜撰一項學科，藉以標新立異。我的想法只是要強調一下比較研究在考古學中的重要性，希望有更多的人重視這種研究方法，致力於有關的探討，使考古學——特別是中國考古學獲得更豐富的成果。

比較研究方法在文史方面的運用，可以說由來已久。比較文學、比較文學史、比較史學等名詞，是大家早就熟悉的。中國學者對歷史文化領域如何進行比較研究，近年有較多論述。例如周谷城先生的《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一文說：「比較研究，即經常拿彼此不同的東西對照看的意思。這樣作，可以使我們易於看出一些不應有的偏見。例如『古典時期』一詞，原來本是只適用於希臘、羅馬。但學者們為着要完成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體系，便不得不把印度、中國、波斯等，也納入古典時期之下。」他

還列舉了一些事例，然後說：「……這類情況，我們如果不採比較研究的方法，或者自始即讀世界史，而不研究一點中國史，換句話說，即不拿中外歷史對照着看，就很不容易看得清，就很不容易作進一步的考慮，或更切合現實的考慮。」他提到他的《世界通史》第一卷講到六個古文化區，即尼羅河流域、西亞文化區、愛琴文化區、中國文化區、印度河流域、中美文化區等，有分區並立，其反面必然是往來交叉，「如果不用比較研究或對照看的方法，則不易看出其重要性，即使看到了也不易從正面突出，給予應有的敘述」。

考古學的情況更是這樣。周谷城先生提到的幾個古文化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考古的探究上的。即使在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之內，還可存在若干種文化，彼此並立，互相融會交流。對這些文化的同異，有必要進行比較考察；對不同的文化區的同異，也應加以比較研究。比較研究方法在考古學領域內，實在是大有用武之地。

中國和外國的考古學有着各自的淵原。現代考古學在歐洲形成，是在十九世紀前期，其前身是所謂古物學（antiquarianism）。中國的考古學則是在二十世紀前期現代考古學傳入後建立的，它的基礎乃是傳統的金石學。金石學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為考古學的興起準備了豐富的憑藉和材料。同時，中國幅員廣闊，文化綿遠，地上地

下有非常弘富的文物寶藏，更使中國考古學有強烈的自身特點。中國考古學者每每局限於國內考古的知識和經驗，外國考古學者又多因語言障礙，不能直接吸收中國考古學的大量內涵，結果是雙方難以溝通，妨害了比較研究的開展。

要把中外考古學真正溝通起來，僅靠考古報告和論著的介紹、翻譯是不夠的。必須對古代各地區、各國家的文化作通盤的觀察，以整個人類的歷史發展為背景，進行細緻的對比研究。這樣，就可以看到各種文化的同異，揭示一些文化間交流影響的關係，並對各個文化在歷史上的地位和貢獻作出恰當的估計，這正是比較考古學設想達到的目的。

比較研究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也有很大幫助。事實上，幾位為在中國建立現代考古學作出貢獻的學者，都以博大的眼界，在不同的研究領域中運用過比較研究的方法。例如李濟先生，在分析安陽殷墟的商文化時，曾廣泛對比當時所有的國內外考古材料。他一九二九年發表在《安陽發掘報告》上的《殷商陶器初論》，引了羅斯陀夫柴夫（Rostovzeff）和博羅夫加（Borovka）的著作，以商周青銅器的饕餮、螭龍等花紋與西伯利亞的動物紋飾藝術對比，反駁了商周花紋受北方影響的論點指出商周文化與北方確有關係，但係商周影響及於北方。一九三二年他

在《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發表《殷墟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更引用許多國外材料來對照。如他根據英國柴爾德（Gordon Child）對歐洲青銅文化的論述，指出「金屬料只有到最便宜的時候才用着箭頭」，因為箭頭一般是不能回收的，殷墟銅箭頭的大量出現表明青銅工藝的發達。他這篇文章最後說：「殷商以前仰韶以後黃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種青銅文化，等於歐洲青銅文化的早中二期，及中國傳統歷史的夏及商的前期。」他的這一推斷，現在已由多年來的考古工作證實了。

夏鼐先生的許多著作，都以世界考古學的成就作為研究的參照。如他對「絲綢之路」作過深入的探討，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方面有重要貢獻。他在《中國文明的起源》書中自述在「絲綢之路」東端西安做過考古工作，又曾沿河西走廊調查試掘，直到漢玉門關遺址，還去過新疆調查；他也訪問過「絲綢之路」西段，包括伊拉克、伊朗的古城。他指出「中西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並不是單方面」，中國輸出絲綢等項，也輸入了毛織品、香料、寶石、金銀鑄幣和金銀器等。夏鼐先生就中國境內發現的波斯銀幣和拜占廷金幣，曾撰有一系列研究論文。

以上所舉，不過是一些例子，很多學者在研究中國考古學時，都應用過比較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就某種文物作具體比較的情形較多。比較研究適用的範圍極廣，只要

是兩種以上的文化，不管是對文化的整體，還是對文化中的某項因素，都可以進行比較，可以對照中國與外國的文化，也可以對照中國境內的不同文化。我覺得，在中國考古學範圍內展開比較研究，不妨分為下列五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中原地區各文化的比較研究。

這裏說的「中原」，比有些人理解的更為廣義一些，是指從陝西關中以至黃河中下游一帶地區。古代自虞、夏、商、周，漢、唐盛世，王朝建都均不出這個地區的范围，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中國考古學早期的工作地點，主要也是在中原。

中原的考古文化，並不是只有單線的發展。這方面的認識，在古代史的研究者間已有先驅。比如《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所刊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就主張「三代（夏、商、周）及近於三代之前期，大體上有東西不同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因對峙而生爭鬥，因爭鬥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於東系，夏與周屬於西系。」這種東西兩系的觀點，至今對這一時期的考古研究仍有影響。

現在我們知道，中原地區的考古文化是相當複雜的，如果簡單劃為兩系，未必能反映實際。古代這一地區的人民究竟應如何劃分，很值得通過比較研究去考察。即使是在秦統一以後，一些文物之間的文化聯繫，也應當通過比

較來探索研究。

第二個層次，是中原文化與邊遠地區文化的比較研究。

這裏說的「邊遠」，是就古代的歷史情況而言，也可叫非中原地區，即中原以外的廣大地區。中國從來是多民族、多區域的統一體，研究歷史文化不能脫離這一前提，但是以往很長一段時間，邊遠地區的考古工作進行不多，對當地的文化面貌了解有限。

這種情況，在近年已有根本的改變。現在全國各地已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數量已經超過四十年前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分佈，其密集和廣泛，更是前人難於想像的。過去學者多認為商文化限於黃河中下游一帶，如今看來，這種文化的影響範圍要廣大得多。以商代青銅器的出土而論，北到內蒙，東到山東，西到陝西和甘肅一帶，南到廣西，其器物均有商文化的特點，表明這種文化的強烈影響。

蘇秉琦先生近年提倡考古學的區系研究，他所主編的《考古學文化論集》，不少論文都是運用區系類型理論的，其中有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一篇，以黃河、長江流域古文化區系與《尚書·禹貢》九州對比，指出古人的九州劃分古老而真實，「視角是處於凌駕諸區系之上的中心位置的俯視角，其視野所及之天下正與

中華兩河（黃河、長江）流域文化圈相當，其中，九州分野又與各歷史文化區大體一致」。這是非常發人深思的。當然，中國的疆域尚不限於《禹貢》的九州。

中原與邊遠地區文化的交流影響，是雙向的。在中原以外很多地方能夠看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同時在中原也能找到來自邊遠的文化因素。比較雙方的異同，使我們能更進一步了解中華文明形成發展的歷程。

第三個層次，是中國文化與鄰近地區文化的比較。

由於地理的接近，人民的往來，同中國文化關係最密切的，自當推中國周圍的國家地區。不少學者在這方面作過探討，例如以中國北方以青銅短劍為特徵的文化與西伯利亞的文化比較，以中國南方發現的靴形鍬、銅鼓與東南亞的文化比較。再如中國與日本間的文化交流，兩國學者長期以來從考古學方面加以研究，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課題。這一類實例，可謂不勝枚舉。

第四個層次，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環太平洋諸文化的比較。

上面談到的中國同鄰近文化的比較，自然也包含了這個層次的一部分。

太平洋的周圍，有亞洲的東部，有美洲，也有大洋洲。地理大發現以後，位處舊大陸的太平洋沿岸的東亞、東南亞，與遙遠的美洲等地古代有否往來，一直是人們關

心的問題。特別是中國，古代有悠久燦爛的文明，其影響曾否遠越重洋，引起學者許多推測。章太炎寫過《法顯發現西半球說》（《章太炎全集》四），云公元五世紀中國僧人法顯至墨西哥，「今考墨西哥文化，尚有支那（中國）文物制度之蛻形」。隨後有類似想法的論作頗多，外國也有持這種意見的作品。無論將來能不能證實往來關係的存在，對環太平洋各地的文化進行比較研究肯定是有益的。

第五個層次，是各古代文明之間的比較。

這裏說的，是指古代獨立形成的各個文明，英國考古學家丹尼爾（Glyn Daniel）在他的《最初的文明》（*The First Civilizations*）中曾有討論。中華文明，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古代文明之一，有着自己獨立的起源和發展。但正如前述夏鼐先生的書所講中國文明的產生，主要是由於本身的發展，但這並不排斥在發展過程中有時可能加上一些外來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通過中國與其他古代文明的對照分析，去考察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法則。一九八六年，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愛爾麗舉行了題為「古代中國與社會科學的一般法則」的學術討論會，不少論文即以中國與近東、美洲的古代文明作出比較研究，有所收穫。

在這種比較研究上，應該反對唯傳播論的觀點。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人們，在歷史前進到類似階段時，會有相同或相似的工藝和美術的創造，不可把這種現象一律視為傳播的結果，否則就會導致錯誤的推論。同時又必須承認，古代人民的活動範圍每每勝過今人的想像，文化因素的傳播會通過若干環節，達到很遙遠的地方。這裏要求實事求是，也就是真正科學的態度。

比較研究還可以從更廣義的方面去理解。不同文化的類似因素可供對照比較，同一文化裏的不同因素（例如表面上看來互不相干的幾種器物）也可供參照研究。有意地利用這種方法，將會使考古學的內涵更為豐富多彩。如果這種方法能為多數學者接受運用，有可能成立新的學科分支，即比較考古學。

比較考古學還沒有成熟，在中國也沒有這方面的系統專著，確實是有待開拓的園地。我自己知識和能力都有限，只是對此心嚮往之，隨手寫了一些讀書筆記。現在選出一部分，加上這篇引言，共成二十節，提供給讀者，以示對這一研究方向的提倡。這些其實都是小文章，題材、體例未求一致，內容彼此也沒有多少聯繫，因此書名就稱為《隨筆》了。其中不妥、疏漏之處，切望方家指正。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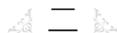
周谷城：《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李濟：《李濟考古論文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七七年。

張光直、李光謨選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一、二，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一九八九年。



青銅器與商周文化的關係

多年以來，商文化和周文化的關係，一直是學者熱心討論的問題。這個問題先是在歷史學界提出，然後影響到考古學界，爭論的勢頭至今不衰。

早年有關這一問題的名作，首推王國維先生的《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卷十）。他根據當時新發現的甲骨文等材料，倡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商周之際」。他的這一看法，是從縱的角度把商周文化區別開來。到三十年代，出現了上節曾引及的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提出夏、商、周三代有東西不同兩個系統，「夷與商屬於東系，夏與周屬於西系」，又從橫的角度把商周文化區別開來。雖然一縱一橫，見解有別，但他們都強調了商周文化的差異。王、傅二氏的觀點，對考古研究有着相當深遠的影響作用。

在考古文物研究上區分商周文化，有不少學者作過探

討。嘗試是從青銅器開始的，瑞典學者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一九三六年發表在《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上的《中國青銅器中的殷與周》，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有關問題。由於青銅器是商周文化的重要因素，通過青銅器去看商周兩種文化的關係是有意義的。高氏的意見，隨着時間的推移，今天看來有些已可商榷，但仍有學者追隨他的思路。

一九五五年，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開始發表。陳氏專門論述了殷商和周初青銅器的區別，他說：「西周初期銅器，除了那些與殷代殷人銅器相同之外，哪些是它自己所有的特色？今天可知的約有以下數端：（一）四耳的簋；（二）帶方座的簋和獨立的方座或長方座（所謂禁）；（三）挹酒器之斗（舊稱勺）的曲折形的柄；（四）向外飛射的棱角；（五）某些殷代器類的不存在，如觚和爵漸少；（六）某些異於殷代器類的組合，如同銘尊、卣的組合；（七）某些殷代花紋的不存在。」他提出的這幾點，今天看也有可修正的。

陳氏的貢獻，實際不在上述七點的正面提出，而在於其反面的啟示。陳文指出的這些差異，都是比較次要的，這恰表明商周的青銅器其實沒有太多的差別。不論是形制、花紋、組合、工藝，兩者都是同大於異。在陳氏以後，又有若干學者作過類似的探討，所得結果也可作如是觀。

近年，陝西一帶的考古工作迅速發展，取得了許多新的成果。周人發祥地的文化面貌，逐步在考古學者的鏟下揭示出來。其中一個令人驚異的事實是，這裏所呈現的商文化的影響，時代之早，程度之強烈，都超出前人的意料所及。

在此附帶講一個小故事。一九六〇年，陝西省博物館和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編著了一本《青銅器圖釋》，把當時那裏收藏和出土的材料都網羅進去。其中有一件商代二里崗期（即商代前期）的銅爵，竟不能估計可能是本省出土的。不僅如此，過去在陝西發現的商代青銅器，大都被指為自河南等地輸入的東西。

現在知道，陝西境內比較典型的商文化遺存，數量很多，分佈也相當廣。即以二里崗期的文化遺址而言，已發現有華縣南沙村、藍田懷珍坊、耀縣北村等處。銅川三里洞等地，則出土了典型的二里崗期的青銅器。這些地點都近於渭河。

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一年，在陝西南部靠近四川的城固龍頭鎮出土了兩批青銅器，更打開了人們的眼界。這兩批器物都是在龍頭鎮上街南側的一個土丘上挖出來的，第一批在土丘東北角，第二批在其南側，共有七十五件之多。青銅器大多數有明顯的二里崗期特點，另一些有地方風格。這項發現表明二里崗期商文化已經影響到這樣偏遠